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書 評

The Rise of the West. By William H. McNeill.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ublished in Mentor Books, 1967, pp. 896. Illus.; maps.)

本書著者馬克奈爾教授 (William H. McNeill) 自一九四七年始即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任教，以迄於今，並主持該校的歷史學系有年。本書於一九六三年始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於次年得美國「國家著作獎」 (The National Book Award)；一九六七年印行「師友叢書」(The Mentor Books)紙面普及本。其簡編世界史 (*A World History*)，於同年 (一九六七) 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印行。本書自問世以來，西方學者，眾口交譽。陶恩比 (Arnold J. Toynbee) 譽之為迄今他所知道的世界史著作中「最表達明暢的」一書。另一位著名的英國史學家特勒佛一洛帕爾 (H. R. Trevor-Roper) 則謂本書不僅是「在為人類全史作敘述和解釋的書籍中迄今所有的一冊最有學問和最富才智的著作，而且也是一冊最有啟發性和最動人的著作。」他說，本書的著者不像有的學者思想家之容易想出的概括來討論歷史的問題。「他處理了歷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中最複雜的問題，應用了考古、宗教、工藝、和美術等多方面的證據。他的學問之廣博，有如其精審一樣驚人，但並不因此窒礙了他的思想。」他說，他自己很慢纔讀畢本書，「實在這也不是一冊寫來供人趕快讀完的書。閱讀本書是一種偉大的經驗，它在我的思想中引起往復的回響，啟發新穎的見識。」

誠如陶恩比和特勒佛一洛帕爾二氏所說，本書題名為西方的興起，其實是一冊世界史著作，主旨乃在敘述和解釋在以中東 (或習稱近東)、印度、歐洲、和中國文明為主體的世界史的背景之上，西方 (或西歐) 文明如何興起。對於一個中國讀者，本書之特殊可貴乃在其以中國歷史完全納入於世界歷史大綜合的主要脈絡之中，由此展示中國文明於世界歷史演進中的地位。本書未直接應用中文史料和著作，但凡屬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西文著作和譯述，則已充分應用，而於腳注中舉述並論道其取材所自和立說的根據。其腳注的豐富，合之殆可成一篇完備而上好的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的西文書目論文。

對於一個中國讀者，本書的另一特殊可貴之處乃在其對於中國學者的著作的重視。著者自謂，近世中國學者接受西方的治學方法和見解，與中國的傳統學術相融會，其所獲致之最特著的成績，乃在漢學方面。（頁八五七）在當世的中國學者中，本書於鄭德坤、馮友蘭、李濟、和何炳棣諸氏的著作，引證尤多。

本書全書分三編，共十八章。首編包括的時期計自遠古至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後，為中東文明的優勢時期。於世界歷史中，自新石器時代農業肇始至文明初啓，中東一直居於先進的地位。農業肇始於西亞山麓的村落；而以城市的產生、有一定形式的政府、法律和宗教的建立、金屬器的製造和使用、以及文字的發明和應用為構成要素的文明，初興於兩河流域（Mesopotamia）。從西亞，農業技術和文明要素傳入埃及的尼羅河流域和印度的印度河流域，基於兩地的農業生產的潛在能力，促成兩地文明的興起；而一旦埃及和印度發展了各自的進步的文明生活，它們隨即成為新的文明傳播的中心，如兩河流域一樣，開始影響四周落後的民族。中東的農業村落約始見於公元前六五〇〇年前後，兩河流域、尼羅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初興於公元前三〇〇〇年前後。因此在公元前六五〇〇年後的三、四千年中，隨着農業技術和文明的傳播，在舊世界可見兩條明顯的界線在不同的地面移動：一條是農業的界線，區分已進於新石器時代和尙滯留於舊石器時代的區域；另一條是文明的界線，區分已開化的和尙未開化的區域。至於同時期中國文化與中東文化的關係，本書就中國西北部黃河流域所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的村落遺址，其中的彩陶在形制及文樣上與在南俄及中亞的同類遺址（中東文明的邊緣地帶）所發現者相似的事實，認為中國的新石器文化可能與中東有關。在中國所發現的新石器文化，其存在的年代遠晚於中東，約當公元前二四〇〇年前後，這使半移動性的原始農業耕種者，得有充分時間，從中東輾轉經中亞一帶沿河及坡麓間宜於耕種的地段，以農業技術傳入黃河流域。不過中國初期的農作物中，從早即有稻米出現，而稻米之開始成為作物一向被認為在亞洲的季候風地帶。所以稻米之一早在中國出現，加強了已有的一項假定，此即農業乃在舊世界的兩處分開的區域發生；而於公元前三〇〇〇至二〇〇〇年間，淵源於中東的穀物種植的技術，與另一淵源於東南亞的穀物種植的技術，在中國的北部交遇。（頁三九至四〇）晚近中國考古學家的傾向不甚重視中國彩陶文化與南俄及西亞的同類文化間的相似。本書認為過去學者強調二者的相似，可能因太重個例而曾有所誇張，但二者相似的事實仍然存在，未可忽視。再者，晚近中國學者的工作多少應受有民族自尊心或有關先史時期的經濟史觀的影響，二者皆過於貶抑文化移動的重要



性。(同上,註三八)

金屬器的製造和應用,使文明社會深入四周的未開化區域,探索礦藏。公元前三〇〇〇至二〇〇〇年間,文明社會因探索礦藏,深入西方和中亞的草原地帶。金屬冶煉的技術隨之傳播。金屬冶煉技術的北傳入草原地帶,就可見的考古證據言,約始於公元前二五〇〇年前後。(頁一一六至七)未開化民族與開化民族間接觸的增加,加以文明社會的技術的傳播,使古代世界的社會均勢發生巨大的變化。在先,社會變化的勢力幾乎完全從中東文明的優勢地位,向落後的未開化區域伸展。現在則未開化人因為掌握了文明社會的戰爭的技術和武器,開始向文明世界入侵。在歐亞草原地帶中央的伊朗高原,因為該地的農業聚落和未開化部落犬牙交錯的緣故,這一變化的發生最為顯著。公元前二〇〇〇年後不久,一項顯示文明技術與野蠻氣力的結合而關係重大的發明,可能就在這區域完成。此即用馬曳馳的輕捷的二輪戰車。(頁一一七至八)它隨即成為全歐亞世界主要的戰場決勝的武器。由此發展完成的新戰備,包括①戰車本身、②強弩、和③為掩蔽戰車之用的四邊形防壘。一旦中亞草原地帶未開化的牧馬者採用了這樣的武備,他們成為可怕的攻擊勢力。其結果是從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前後始,在全歐亞大陸地面对文明社會的一連串迅速而廣大的入侵。在這一連串蠻族入侵的浪潮中,有來自南方沙漠性草地的塞姆語人,有來自山地的胡利人(The Hurrians)和古賽人(Kassites),而居於領導地位者則為來自中亞草原地帶的印歐語人。印歐語人成為大多數攻擊的組織者和領導者。(頁一二六)這次駕馳戰車的武裝部落的活動範圍之廣,大抵全歐亞大陸,從大西洋至太平洋,唯有東南亞的叢林地帶和極北的苦寒之地,未有他們的踪跡。本書指出,上述的馬和戰車、青銅武器、強弩、和四邊形城壘,在古代中國的黃河流域應有盡有,於商代時且已充分發達。此可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農業村落,也必曾受同樣的武力的侵略。(頁一二二)但此不必即謂中國也曾受印歐語人的征服。因為在侵略的浪潮東來途中,在侵略者羣中可能會先後發生巨大的語言和民族成分的變化。當侵略者從一處沃地進行至另一處沃地時,可能如像接力賽跑一般,最後到達終點的人,不必仍是首先起跑之人。(頁一二二)

從公元前一七〇〇年前後開始的歐亞民族的擾攘,繼續了約二百年。在其後的一千年中,在中東,武力與文明的擴張交互為用,開始形成强有力的國家組織。舊有的地理和文明的界線破除,最後是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後一個世界性的波斯大帝國的出現,包含中東文明的核心區域(兩河流域和尼羅河流域)及其邊緣地帶。同時則見三大新文明

——印度、希臘、和中國——逐漸形成各自所特具的形式。因為所有的新文明都是在駕馳戰車的入侵者和當地的農業生產者的交互作用下產生，所以它們之幾乎同時發展和形成各自的形式，自不足奇。到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後，印度和希臘的基本的社會制度發展完成，前者為種姓制度，後者為城邦制度。這一千年，在中國歷史中約當商代中期至春秋之末。本書認為，可能中國因地位孤立，社會制度的發展比較緩慢，要待漢朝建立，成熟的中國文明的家族和帝國仕宦組織，纔豁然呈現。（頁一八六）

新文明與中東文化的關係，以上承愛琴文化的希臘最為直接。其次為印度；但印度的甚多文明因素，如字母文字和冶煉技術，仍係從中東文明區域傳入。中國的情形最為特殊。遼闊的草原、叢山峻嶺和沙漠，構成黃河流域和中東之間艱難的地理障礙。此外尚有政治和軍事的阻礙。要待公元前一〇〇年後「絲道」打通，中、西在陸上始多少有正常和直接的交通可言。因此當中國文明尚在化成階段、容易接受外來影響的期間，中國所受自中東的，不過容易假手於蠻武不文的未開化人傳往的事物，青銅武器和用馬駕馳的戰車即其一例。比較精微的發明如字母文字，便不能超越野蠻和地理的阻礙傳往。及至公元前第一世紀中、西的交通開啓、中國人有機會學習字母文字時，他們的語言和學術傳統已與自己的文字系統深相結合，無從改變了。（頁一八六至七）迨公元前五〇〇年前後，新文明既已分別長成，中東文明的先進的領導地位從此喪失。（頁二六七）

本書第二編包括的時期約自公元前五〇〇至公元一五〇〇年，為歐亞文明的均勢時期。在此二千年中，四大主要文明繼續有擴張發展，它們不時受境外所發生的變化的影響，有時相互交通往還，同時則不斷受草原遊牧民族的侵擾或征服。但這時期所有變化的發生，無礙於大體的均勢的維持。

這時期開始的三個世紀中，世界史中最顯著的事實為希臘文明的全盛與東方的希臘化。但中國經戰國時代、秦的統一、至漢帝國創建，則造成此時期中最有意義之事，此即文明世界的合龍（the closure of the ecumene）。（頁三三八）公元前一二八年前後，張騫使西域，抵大月氏；一〇二年，李廣利征服大宛，於是中國和西域之道通。「絲道」由此經安息往西，至中東。而羅馬的勢力又東來，公元前一四六年，羅馬已征服希臘；六五至六二年，收西亞入版圖，國境與安息相接。這使歐亞大陸，從大西洋岸至太平洋岸，一連串的文明帝國疆界相接，而「絲道」橫貫其中。這文明世界在南側尚有海道相通。印度自古與中東沿海有海上交通。一旦印度洋上的航海者獲知了季候風之為用，他們的活動自然越阿剌伯海而東。他們在孟加拉灣東岸與從中國東南沿海南來的航

海活動相銜接，其結果是一條連繫中國和印度的海道的開通，時期可能同在公元前一〇〇年前後。最遲至公元後第二世紀時，從埃及、經南印和馬來亞、至中國的一條連繫羅馬和中國的海道，也已開通。（頁三二四）

在公元前後的三、四百年中，文明世界達於前所未有的密切的連繫。但所有的主要文明皆各自獨立；文化的交流雖時時發生，然外來文明的承受皆出於志願。沒有一種文明以自己強加於他人，或因此而使另一文明的固有形式發生劇烈的變化。（頁三二五）這時期的主要的衝擊來自草原民族，因為這也是草原民族活動的一個偉大時期。公元前第九、第八世紀，可能仍在伊朗高原和鄰近的草原地帶，騎射的大規模應用開始。於是草原民族與開化民族間的軍事的均勢又變。騎馬游牧民族的勢力的勃起，使全歐亞大陸的北部和中部，普遍發生政治和軍事關係的動盪。公元前第八世紀初年西周之亡於犬戎，可能就是此普遍動盪中所發生的事故之一。中國於戰國末年由趙武靈王胡服騎射，秦並以騎射得天下，但文明世界仍連續受騎馬游牧民族的攻擊。蒙古及其鄰近區域現在成爲此種攻擊力量的來源所自。因為在歐亞草原的這一極東部分，自然條件的酷烈，使居民只能維持刻苦嚴格的游牧生活。一旦他們習於騎射（約公元前四〇〇年前後），又得豪傑之士組織之，自然呼號成羣，成爲標悍的攻擊力量。（頁二六七）中國的秦、漢兩代先有匈奴之患；至晉有永嘉之亂（公元三一一年），引起五胡亂華。而永嘉之亂與五胡亂華不過是一次世界性的民族大運動的前奏。因為永嘉之亂後不過半個世紀，在西方有匈人的進攻日耳曼人（公元三七一年），引起日耳曼人的大移動和羅馬帝國的覆亡；又半個世紀，有白匈奴的侵據中亞和印度。至公元第十三世紀蒙古人西征，並併有中國，而騎馬游牧民族的活動達於極盛。在世界史中，自公元一五〇〇年前後始，由於槍炮製造的發達及其應用的推廣，騎馬游牧民族飛揚跋扈的時代，乃漸成爲過去。（頁五四五）

中國自永嘉之亂後蠻族入據，國家分裂，至隋的開國（公元五八九年），其間不足三百年，便已統一再造，國力恢復，中國文明且即將進入其歷史中最輝煌的時代（唐、宋）。反顧西方，則當時尙沉淪於黑暗時代的漫漫長夜之中。本書認爲中國於公元一〇〇〇年前後已進入近代。因為其後以迄於二十世紀，中國的社會組織雖繼續發展擴張，然其主要的結構不變。這使中國文明比西歐文明先進於近代，故無怪馬哥波羅見了中國的繁榮進步，要爲之驚訝贊歎。但中國文明雖先進於近代，然就其以後的演進視之，則含有內在的弱點。這使歐洲終於在近世的進步中超過了中國。中國文明的弱點，本書認爲主要在於其經濟、社會和政治關係的阻礙商業的發達和資本的積累。（頁五一二至

五) 當公元一〇〇〇至一四五〇年間，中國社會頗似將產生一個如西方於中世晚期和近世初期所產生的布爾喬亞階級。南宋水道貿易的發達、長江流域和東南沿海大城市的興起、航行東南亞和印度洋的船舶數量的增加、以至元代商人階級地位的提高，都屬有利的因素。(頁五七八)但一個强有力的布爾喬亞階級卒未產生。繼明初的大航海時代後，政府再申海禁。因為明朝既再遷都北京，防蒙甚於一切，無餘力他顧了。(頁五八〇，註八九)商業的未能發達，結果使中國的甚多發明如紙、瓷器、火藥、印刷術、和羅盤，在中國未曾充分發揮效用，其充分發展應用乃在西方社會。(頁五一五)

本書第三編包括的時期約自公元一五〇〇年至今，為西方文明的優勢時期。經歐洲的海外發現和擴張，在這時期的首二世紀(公元一五〇〇至一七〇〇年)中，世界均勢關係開始從過去的以陸地為中心，改變為以海洋為中心；歐洲的優勢已成，但猶未破壞舊時的四大文明並峙之局。在其後約一個半世紀中，除遠東外，世界均勢關係有了決定性的變化；西方文明的支配地位造成；俄羅斯與北美加入西方世界。由於俄羅斯與中國疆土擴張的結果，歐亞草原最後喪失了它在歷史中的特殊的軍事和文化的地位。迨公元一八五〇年後，經過了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西方文明，終於建樹了它在舉世的優勢的地位。本書認為，西方文明在世界的優勢方興未艾。第二次大戰後，歐洲的帝國雖相率敗亡衰替，然世界的西方化則方以全面加速進行。(頁六二一)中國在這個以海洋為中心的時代仍不能免於一次草原民族(滿清)的征服；而在西方文明優勢的建立期中，它也尚有一個偉大時代(公元第十八世紀)，以它的和平和繁榮、學術和藝術的成就，「令歐洲的遠人歎服。」(頁七七三)本書的作者指出，中國在二十世紀因日本的侵略和內部的不安，未能對世界性的西方文化作充分的調整和適應。但他認為，中、西文化的誠意而認真的切磋，將會在本世紀或下世紀產生歷史中最重要的文化的交會。

本書為一綜合性著作，然書中對於局部史事的深入的論究亦多，於此不能歷舉。本書除應用綜合的方法外，也兼用比較，以顯示不同文明所具有的相同的成分(parallels)。本書有少數見解我們或不能同意，如其分析中國抗戰前後政治形勢的變化，完全歸咎於內在的因素，忽視外力的影響。(頁八五七)本書也偶有措辭不恰之處，如稱西漢建國的小吏為「高祖」，不稱劉邦；謂武帝綽號曰武帝(nicknamed the "Martial Emperor")，不曰諡號。(頁三三七至八)但小疵不足為病，言之博一粲而已。

王德昭